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 林毅夫

本文梳理总结了本人3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的心得。我早期的工作集中于中国农村改革,受1988年中国政府治理通胀方式的启发,此后逐渐形成一个有别于现有的发展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结构经济学。该理论体系为现代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带来了许多新的见解,也对一些现有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和争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答案。此外,我的其他研究主要涉及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史、中国文化复兴和经济学方法论等领域。

从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拿到博士学位开始,独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到现在转眼30年,《论语·为政》篇上孔老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我从自己独立进行研究到现在的时间已经两倍于孔老夫子从学到立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30年只不过一瞬间,而对于一位60多岁的人来说,30年则是半辈子。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到底30年的工作是否在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上留下些刻痕?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和后人来评说。不过,作为这代中国人中最早在海外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回到国内来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总结一下自己的工作,或许有助于同行和后来者了解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侧面。

回想起来,30年来我的研究一直围绕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早期集中在农业、农村的变革,后来扩展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形成了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工作后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除了这两个方面,我也对新制度经济学、历史、文化、方法论等发表过些看法。现将我研究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和结论简要介绍如下:

一、农业经济学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的农村改革,毕业后延续了这方面的研究。我早期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现代化三个方面,至今国内外经济学界,许多人仍称呼我为农业经济学家。

1.农业生产制度改革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从集体的生产队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中国农业也获得了连续多年的丰收。不过,当时经济学界以Ward(1958)的论文以及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两人分别在1966年发表的理论模型为基础的主流文献认为集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Wald,1958;Domar,1966;Sen,1966)。主流文献的这种观点难以解释中国农村改革为何能伴随着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我的博士论文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性,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证明:在按劳分配的合作农村中,农民劳动投入的积极性取决于劳动衡量的准确性,在农业生产劳动投入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家庭农场是一个最合适的农业生产组织,并以实证资料验证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增产中有近一半来自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向家庭农场性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我的博士论文被我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ne Schultz)教授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发表了多篇论文(Lin,1987;Lin,1988;Lin,1992a;Lin,1991a;Lin,1990),其中199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政策论文奖,并成为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从而获得出版SCI和SSCI的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的"经典引文奖"。

2.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国改革开放后,从集体农场向家庭农场的改革伴随着农业的增产,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在完成了土改以后,随即推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业也持续增产,不过在1959—1961年间突然出现农业生产大幅滑坡,导致了一个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农业合作化运动早期带来了农业增产,而后导致的农业生产下滑、停滞的现象也出现在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做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后,我开始思索上述问题背后的道理。1991年我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说明在农业生产劳动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须拥有退出权,当其他社员偷懒(不自我约束)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以作为惩罚。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热衷于合作化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将退社的勤劳社员误认为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如果政治上把退出的权利剥夺了,勤劳的社员在不自我约束的社员偷懒时无法自保,也可能会跟着偷懒,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Lin,1990)。《比较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在1993年第17卷出版了一个6篇文章的专辑讨论退出权假说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败。后来,我还发表了多篇论文,解释为何1959-1961年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集中在农村(Lin and Kung,2003;Lin and Yang,2000;Lin,1998a)。我的看法是中国从1953年开始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政府以统购统销的方式集中农村剩余来支持工业化运动和保证城里的工人、居民低价的农产品配给,在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政府以行政手段保证了城里的工人和居民的口粮,使得农村缺粮的情形雪上加霜,因而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情形反而集中在生产粮食的农村。其中,与杨涛合作发表于2000年《经济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论文"Food Availability,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是第一篇以严谨的经验实证来验证阿马蒂亚·森提出的食物获取权对饥荒影响的假说。

3.农业现代化

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2篇理论和实证论文(Lin,1996;Lin and Wen,1995;Lin,1995a;Lin,1994;Lin et al.,1992;Lin,1992b;Lin,1991b;Lin,1991c;Lin,1991d;Lin,1991e;Lin et al.,1991;Lin et al.,1989),强调由于各地气候、地质条件有所差异,适用的农业技术需因地制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产量,应该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分权化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我也根据对全国各省市区地一级农业科研机构的调查,和沈明高、周皓合作出版了一本《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林毅夫等,1996)。我还论证了耕作制度、教育、信贷、农村要素市场等对农业现代化技术的影响。这些发表从数量上来说可称得上是成果累累,不过大体上是以中国的经验数据来验证国际上主流的观点。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91年发表在《发展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上的"Prohibition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说明在计划经济时,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不能流动。然而在没有要素市场的情况下,要素相对丰富程度的变动也会影响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对技术变迁的诱致效果,会和有要素市场时要素相对丰富程度的变化影响要素相对价格时一样,诱致替代稀缺要素的技术变迁,文章中我还以中国的实证资料验证这个理论模型提出的假说。这篇文章把Hayami和Ruttan在市场经济下由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动引起的诱致性技术变迁假说的运用范围延伸到了计划经济和缺乏市场的传统农业社会中(Hayami and Ruttan,1985)。

1992年,我将农业经济方面的论文收集成册,以《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为题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获得了1993年孙冶方奖。1998年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学会授予我每两年颁发一次的约翰·克劳福德爵士奖,表彰我对农业经济学的贡献。1999年我的论文"技术变迁和农业家庭收入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得《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杂志》年度最佳论文奖(Lin,1999)。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集《再论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同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和200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1998年时位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和小麦研究所还邀请我以"中国过去如何养活自己?中国未来如何养活自己?"为题发表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Lin,1998b)。

由于我在农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2005年获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二、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我在1988年时想通了为何中国政府不以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以提高名义利率的方法来治理当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而是以被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非理性的、无效的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办法来"治理整顿"高通货膨胀背后的道理后,形成并逐渐丰富的一个有别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理论体系框架。在1988年以前我和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西方主流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我在农业经济学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以中国的实证资料来验证主流经济学现有的理论假说,或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一点延伸的工作,如果有独创的见解,像退出权假说等,也只是零敲碎打的观点。从想通了1988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我开始抛弃了现有的西方主流理论,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诸多现象时,总以"常无"的心态,自己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达成目标的最优选择为何等,来分析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我研究了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提出的解释竟然一以贯之,自成内部逻辑自洽的体系。2009年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职一周年的一个内部会的报告中,我首次将我系统研究的成果及其理论框架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2010年耶鲁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邀请我去做一年一度的库兹涅茨讲座,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的理论框架"为题发表演讲,演讲稿次年发表于《世界银行经济观察》(World Bank Economic Observer)第26卷第2期,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提法首次正式见之于学术期刊。

新结构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来说是以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作为切入点(Kuznets,1966),倡导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包括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主张在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强调思想理念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上的决定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即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获取社会上可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其前提是企业所在行业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微观分析基础,试图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和相关的生产活动特性的差异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使没有结构(更准确地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其暗含的唯一结构)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成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特例。具体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上的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1)由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式是按照该国每一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和所要采用的技术。由此,该国将会用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最大的竞争力,创造出最大的经济剩余,投资会有最大的回报,积累的积极性会最高,资本禀赋增加和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速度也会最快。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此路径来发展,在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上也可以享有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实现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收敛。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自发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这样的相对价格只能存在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以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为制度前提。由于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而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者给予外部性的补偿,和协调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这些工作仅能由政府来做,因此,也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经济结构才能顺利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变动。所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前提。

(2)由于对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缺乏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后,出于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观良好愿望,试图在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为这种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政府想优先发展的这种产业违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使得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须靠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对市场的干预,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才能把这种"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结果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虽然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了,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低下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3)由于对政府的各种扭曲和干预是内生决定于保护补贴赶超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缺乏认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倡导以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用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次性地把各种保护补贴取消掉,来进行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20世纪80、90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建议,用休克疗法来进行转型,结果不是新自由主义所预期的经济稍微下滑后快速的"J"曲线复苏,而是"L"曲线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出现了所谓的"迷失的二十年"。

(4)根据上述理论框架的分析,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的,被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Murphy et al.,1992),其实是一个务实的、比较好的转型策略。这种转型方式一方面给予旧的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产业的准入。并且在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好、政府可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方式局部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因势利导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在转型过程中能够同时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绩效。快速的发展则能够不断积累资本,使许多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企业由不具自生能力变为具有自生能力,旧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也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能够取消掉,也应该取消掉以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上述的发展转型分析框架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现象提出了和现有的理论不同的解释或新的观察。这里试举两例:一是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由国有产权的性质决定的(Janos,1986)。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是国有企业承担了国家赶超任务的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或是由于提供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引起,并认为在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加剧预算软约束而不是减轻预算软约束(Lin and Tan,1999;Lin and Li,2008);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应以消除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性负担为前提(Lin et al.,1997,1998;林毅夫等,1997)。对俄罗斯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新结构经济学对预算软约束原因的分析和私有化效果的预测。二是潮涌现象。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当产业升级时,由于企业家容易同时看好一个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市场决策分散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许多企业同时投往这个产业,等到多数投资建成时,产能即出现过剩。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家电产业和最近出现的钢筋、水泥、电解铝、光伏产业的投资过热和其后的产能过剩就是例子。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机制我最早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2010年和巫和懋、邢亦青合作的另外一篇论文则构建了一个博弈论的模型来说明(林毅夫,2007a;林毅夫等,2010)。

理论的作用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提出新的发展理论体系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帮助政府、企业、家庭等决策者采取行动实现其预期目标以改造世界。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制定框架(Lin and Monga,2011a),以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充满扭曲和瓶颈制约的软硬环境下推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发展政策评论》(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在2011年的第29卷第3期中对"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出了一个9人参与的讨论集。国际经济学会则于2012年春和冬分别在华盛顿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各开了一个产业政策研讨会,会议论文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Toseph Stiglitz)和我编辑成上下两卷《产业政策革命》的专辑出版(Stiglitz and Lin,2013)。

从2011年开始我利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推动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非洲国家试行设立工业园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用一站式服务改善营商环境,以招商引资来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试点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改变了过去世人认为非洲那些落后的,尤其是内陆国家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的看法,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减少贫困,推动产业多样化,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新结构经济学也因此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受到学界、舆论界、政府决策部门和国际发展机构越来越多的重视。

除了对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系统认识之外,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也不同,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框架也为现代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带来了许多新的看法。现简要列举几点:

(1)最适金融结构理论:现代金融理论一般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并以此种安排作为先进的制度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生产活动的风险特性也不同。不同的金融安排,例如作为间接融资的大、小银行和作为直接融资的股市、债市,具有不同的资金动员能力和风险分散能力。金融的作用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因为产业结构所决定的资本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差异,最合适的金融安排也就不同,因此,合适的金融结构应当内生决定于发展阶段和产业的特性,而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最适金融结构的理论由我最早提出(林毅夫等,2009;Lin et al.,2013),扭转了国际金融学界只重视金融深度,不重视金融结构的主流看法。现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如Asli DemirgucKunt和Ross Levine以实证研究支撑这个观点。

(2)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现在主流的宏观理论是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主张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投资和消费来平滑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则认为存在李嘉图等价,政府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家庭则会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以支付未来政府加税弥补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加的财政赤字,结果总需求不会增加,积极财政政策推行的结果只增加政府的赤字,对平滑经济周期没有作用,而反对在衰退和萧条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则结合了周期和增长理论,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期,用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可以增加需求减少失业,稳定经济增长,长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政府税收弥补扩展性财政所增加的赤字,是一个一石双鸟的政策。根据这个理论,2009年年初我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率先倡导各国在经济衰退萧条时期,用支持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Lin,2009b;Lin et al.,2012)。这个建议现在已经为国际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接受和倡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特地在2014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宣扬在经济下滑时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IMF,2014)。

(3)流动性陷阱:主流理论认为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和萧条时,会伴随产能过剩,由于其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因此,不管利率多低都难以刺激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而出现流动性陷阱,推行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只是刺激资产泡沫,如发达国家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出现的情形。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降低利率可以刺激企业向中高端产业投资,而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将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的运用空间大。

(下转A3版)